

苏小和作品系列

1820

1911

1937

1949

百年 经济史笔记

下卷 · 第三次开放

苏小和 著 刘晓光 主编

1820 —
1911 —
1937 —
1949 —

百年 经济史笔记

下卷 · 第三次开放

苏小和 著 刘晓光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经济史笔记 / 刘晓光 主编；苏小和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60-8931-9

I . ①百… II . ①刘… ②苏… III . ①中国经济史—近现代 IV . ①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6486号

百年经济史笔记

(BAINIAN JINGJISHI BIJI)

作 者：苏小和

主 编：刘晓光

策 划 人：张 杰

产品经理：赵颖畅

责任编辑：赵颖畅 王丽娜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25

字 数：51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931-9

定 价：92.00元(全三册)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 录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不可避免的经济学走势

一、几个重要的学术史资料	002
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学思考	006

第二章 统购统销制度与市场自由交换秩序的式微

一、统购统销制度的经济学目的	014
二、统购统销制度对市场交换的破坏	018
三、一场经济的悲剧从统购统销开始	025

第三章 公私合营运动与中国企业家产权的丢失

一、公私合营运动的理论先导	031
二、公私合营从上海开始	038
三、公私合营的扩大化	043
四、毛泽东的座谈会	057
五、企业家的心态分析，以荣毅仁为例	072
六、1956年的单一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	081

第四章 中国企业家消失的案例分析

一、企业家消失之刘靖基	091
二、企业家消失之周叔弢	097
三、企业家消失之刘国钧	102
四、企业家消失之姚乃炽	107
五、企业家消失之陈铭珊	112

第五章 1978 年前的中国企业格局

一、庞大的工业企业布局	128
二、狂飙突进的地方企业热潮	137
三、群众运动与技术革新	145

第六章 中国终于开始向经济规律低头

一、陈云和邓小平联手反对新一轮“大跃进”	152
二、那是一个没饭吃没房子住的国家	162
三、那是一个对现代市场经济完全不了解的国家	168
四、那是一个贫穷却又严重浪费的国家	170
五、中国经济从头再来的基本共识	174

第七章 向市场经济规律的有限回归

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个词语	185
二、经济学家第一次讨论市场经济	193
三、放权让利，从企业开始	201
四、行政分权与区域经济竞争的兴起	213
五、放开流通管制与市场自由交换体系的初步形成	222
小结 对计划经济错误的再反思 / 234	
后记 / 239	
参考文献 / 245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不可避免的经济学走势

《资本论》的经济学前提是假定人类市场生产资料的不稀缺，假定人是可以量化的、静态的人，不存在其不确定性，因此推导出一个人人按需分配的整全福利社会，抹杀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忽略市场的边际收益递增或者递减。

——米塞斯

如何沿着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分析方法，理解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变迁，需要强调一个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经济学面相乃是德国和苏联式的大政府主义计划经济模式^①，而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经济学面相，依然是全盘学习苏联模型。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史事实，必须要陈述清楚。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逻辑意义上，这样的陈述乃是我们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工作。我们的问题意识由此产生：为什么中国经济的现代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跨越两个完全敌对的党派阵营，却共同选择了同一种经济学面相？这中间隐含着一种怎样的经济学错误？

^①拙作《倒退的民国》第六章“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型”，分析了蒋介石政府的经济面相与德国和苏联的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

一、几个重要的学术史资料

蔓延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之争，以及与这个经济史有关的经济学思想史之争，即著名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经济学大辩论，必须要进入我们的分析框架。这个重要的经济学学术事件，看上去似乎与中国经济史的变迁并无必然联系，但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们，却能看到隐秘的联系。国内党史学者杨奎松先生的《中间地带的革命》，有一个重要的副标题，“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就是把共产中国的兴起与整个国际大背景的发展整合在一起，进行了缜密的思考。^①

整体意义上，我们基本认同杨奎松先生的观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差异、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期内成功、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人侵中国的影响。基本的分析路径如下。1927 年蒋介石学习德国和苏联模式，推行官僚市场经济，类似权贵资本主义。如果不是日本人侵华，蒋介石政府会取得 GDP 的大收获，使中国提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推动中国提前走入市场经济框架之

^①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内的后发国家行列。^①但日本人的侵入，导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断，国家进入救亡状态，经济学意义上的官僚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展开即宣告结束。这意味着两个重要的历史结论：第一，日本侵华才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与企业史双向叙事历史的杀手；第二，民族救亡大于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当然也大于中国国内的党派利益之争，这间接地给予了共产党一次千载难逢的崛起的机会。^②

这正是杨奎松先生的论点，亦是诸多民间历史学者反复论述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以建国，一是苏联人的国家制度模型和经济制度模型助推中国，二是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政策无意之中为整个亚洲的共产主义兴起提供了机会。杨奎松将这样的观点史料化、体系化，终于让我们完整地了解了这一段恢宏的历史真相。

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起点。中国近百年的国家形态，的确是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一个必然现象。沿着杨奎松先生的分析框架，我们提出的问题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格局究竟在哪些层面偶然推动了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

这其实涉及更加广阔的历史现象，从思想的勃兴到经济的变迁，似乎各种力量在逼近偶然，或者说是必然。我们是说，相比那些具体的政治力量的博弈，如果我们站在经济史和企业

^① 这里的后发国家，隐含杨小凯所陈述的后发劣势，即一个国家在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的时候，通常会忽视或者拒绝模仿先发国家的政治制度框架。由此导致后发国家的劣势出现，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② 这里借用的分析方法，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分析范式。

史的双向叙事维度看问题，或许看得更加透彻。

凯恩斯在他的杰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不论是福是祸，带来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用这句话来回顾蔓延人类社会百年的社会主义史，以及中国从1949年磅礴展开的社会主义运动，竟然有一种纵深的穿透感。这里必须提到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和他更加重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前者的经济学前提在于假定人类市场生产资料的不稀缺，假定人是可以量化的、静态的人，作为一种个体，不存在其不确定性，因此推导出一个人人按需分配的整全福利社会，从而抹杀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忽略了市场的边际收益递增或者递减，因此《资本论》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人的基本属性，背离了市场的自由演进原则。^①

从时间的流变看，《资本论》的影响力已经达到110年，而这样的110年，恰好是人类社会主义革命蔓延世界的110年。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建国的首要动力，仍然如凯恩斯所言，来源于思想的影响力，而且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力。这究竟是福还是祸，每个热爱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现实的局面是，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欧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把抵制计划经济思潮当成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而苏联的计划体制在1989年宣告彻底失败，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沿着市场经济的路径开始走出计划经济

^① 这是米塞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批评性观点，参见米塞斯《人的行为》第一章，夏道平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70年版。

的阴影，从而在30年之后赢得了一些看上去不错的经济成就。

历史有时候非常具有一种偶然性的吊诡！当马克思的理论在全球应声者众的时候，1929年，整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20世纪30年代出现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人们以为一个美好社会即将出现，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局面。

所谓潮起潮落，随波逐流，新中国刚好赶上了这次经济起伏的周期，毛泽东的成功，就是以计划经济的名义将中国人聚拢。这正是他的核心经济思考：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革命行为，还是1949年之后的建设行为，他不会有第二项选择，计划经济

方式是唯一的方法论。^① 这是一次中国人无法避免的计划经济时代，好在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规律，60年之后，全世界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只是这样的60年，人类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的经济图景和国家图景因此化为乌有。而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背景下，才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我们的市场经济叫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学思考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通过一篇重要的讲话，在中国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

“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

^① 参见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第一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本书诸多涉及1949年之后经济政策变化的史料，均来自林蕴晖先生的研究，因此史料属于“前揭书”意义。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①

这样的表述，隐含着三重政策倾向和一个新兴的政府接下来的基本政治走向和意识形态走向。其一，经济政策走向，总体是要向苏联学习，而不是在国内靠自己摸索，这是一个单向度上的开放，即中国的国家建设向苏联开放，而当时苏联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短期来看的确是比较发达的一种经验。其二，有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锁定，即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全面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靠拢，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日后治理国家的思想传统。其三，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尚未完全采取一种强力意志来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是保留着一种协商和说服的姿态。事实证明，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在思想市场的层面的确还保留着一种有限的多样性声音。

不过问题是明显的。第一，这种单向度的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政策走向，遮蔽了一个新兴国家在发展初期的更加全面的视野。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处于渐渐复苏的状态，可惜新政府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者是没有能力看到这一点。第二，这种向苏联全盘学习的方法，并不是一种经济学常识上的学习，更多的是一种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联盟，这导致新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严重缺乏市场经济的常识。而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健全的体系，可惜新政府无论

^①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是经济学理论的层面，还是政府经济决策的层面，在这方面均处在局外人的水平。第三，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在全国都已经处于领袖地位，因此他的讲话无疑是一个动员令，是一个新兴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和指南。

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共中央迅速行动起来。先是全体干部的理论学习运动，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几乎所有共产党干部都必须学习联共党史的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毛泽东亲自带头学习，目标要求很高，全体干部必须系统了解苏联实现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而且必须要掌握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际运用苏联经验的工作能力。^①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面积的经济发展理论学习。毛泽东充满了一种志在必得的雄心壮志，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更加明确地向全党指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习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②

一份名为《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文件面向全国下发，一个学习苏联的运动几乎深入中国的每一个田间地头。效果是极为明显的，广大干部群众很快形成了一个理论思想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想繁荣富强，唯有向苏联学习。而苏联大力推行并取得巨大成

^① 参见《中央关于 1953—1954 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

^②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8 页。

就的经济制度，核心要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灵魂是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以国家占有为唯一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以苏联集体农庄为组织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因此，中国要全面实现由国家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即全社会的经济生活都必须由国家实行统筹安排。^①

面对这样强大的经济政策走向，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个必须马上提出的问题是，毛泽东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经济政策导向，是否就是全面意义上的苏联经济政策。

事实上，列宁在1921年曾经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进行过一些反思，直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个改变，主要指苏联经济从战时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导向转换成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在共产主义思想史的意义上，列宁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苏联人试图摆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框架的一次经济方针层面的改良型努力。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不是立即按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则改组经济，而是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的体系。而对社会经济的改造，列宁认为不能采取战时革命的方式，而是要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列宁反对疾风暴雨式的经济破坏性建设运动，而主张通过曲折、迂回的中间途径实行经济转型的过渡。而对于什么是改良主义，列宁也有自己的陈述，基本意义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包括旧的商业，小农经济、小企业、市场资本主义。列宁的意思是，首先

^① 参见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要让这些旧的经济形式大面积发育、兴盛，然后再试图谨慎地调整和掌握。对于蔓延的小农经济的集体农庄道路，列宁也认为，不应当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奢望一种快速的集体化过渡，应该尊重农民的利益，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建立起工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盟，只有在此基础上，合作社的出现才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意义。更加重要的是，列宁说，在无产阶级掌控国家经济的国家，应该在一定限度内容许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展开经济竞赛。^①

熟悉中国 1949 年前 30 年经济史的人们应该能看出，中国大概从 1953 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导向，毛泽东或许没有仔细研读过列宁的经济思想，或许他自己认为有足够的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超过苏联、超过欧美。总之，在接下来的 10 年之内，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极度兴奋的时代，没有改良、没有过渡，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大概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全面“大跃进”的经济政策面相。

另外一个需要展开的问题是，毛泽东所构建的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政策，有没有在接下来的历史过程中得到有效反思和纠偏。答案是否定的。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就是苏联模式的盛行，新中国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都理所当然全面跟随苏联。加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偶像，

^① 参见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不可能有人对他进行有效制衡，因此由毛泽东制定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的正确道路。甚至到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依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总路线经济政策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①

如何在一般经济发展秩序的意义上解读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模式，有一些相关的学术思想值得提及。

林蕴晖先生把重点放在国情上，他认为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和搞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当作样板，都严重背离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传统，不利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②林蕴晖的这种分析性观点，后来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即提倡尊重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经济传统和经济格局的差异性。或许日后成为主流口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来自于林蕴晖这一代人的经济学分析。

逢先知、林冲的问题重点在于经济速度，即认为毛泽东的经济学模型一开始就掉进了急躁冒进的陷阱里，这导致中国50年代的经济发展严重违背了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按照毛泽东在1945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讲话稿，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中国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